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

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

以国家和南方祀神之风互动为焦点

杨俊峰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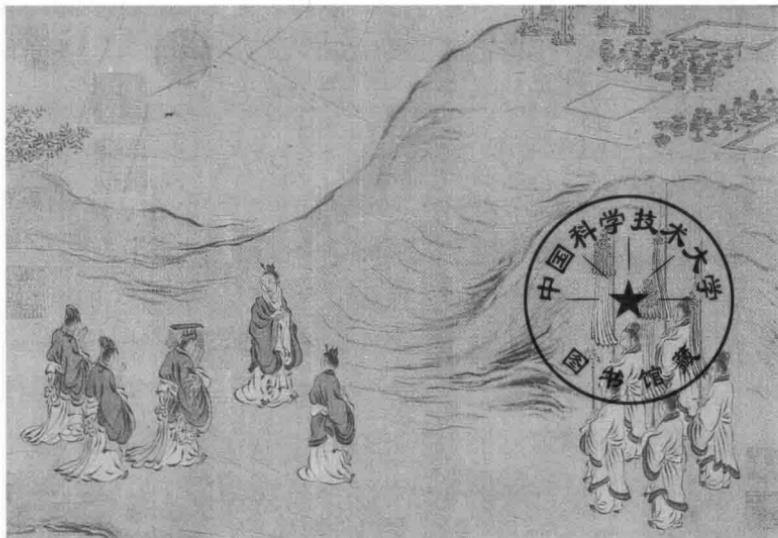
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

以国家和南方祀神之风互动为焦点

杨俊峰 著

The State and CiSi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ustom of
Worshiping the Gods in the South

Yang Junfeng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以国家和南方祀神之风互动为焦点 / 杨俊峰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ISBN 978-7-5325-9209-8

I .①唐… II .①杨… III .①祭礼—研究—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K892.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9863 号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

——以国家和南方祀神之风互动为焦点

杨俊峰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25 插页 3 字数 277,000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209-8

K · 2645 定价：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谨以此书献给我挚爱的家人和太太王静新
谢谢他们在学术之路上一直的支持

本课题研究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人文学科整体推进重大项目
“中古中国的知识、信仰与制度的整合研究”

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余 欣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 邓 菲(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冯培红(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姜 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马孟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任小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孙英刚(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唐 雯(复旦大学中文系)
温海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徐 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游自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余 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余 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张金耀(复旦大学中文系)
张小艳(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朱 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朱玉麒(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书系缘起

余 欣

在学术出版过度繁荣的当下，各种“大典”、“巨制”俯拾皆是，“标志性成果”风起云涌，我们推出这套丛刊，究竟意义何在？我不断扪心自问。

我总想起，当初激励我投身“不古不今之学”的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幾的一段话。子玄撰成《史通》后，惧其不传于世，喟曰：“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漪，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是知古人不轻言著述，凡有所作，必殚精竭虑，巧构精思，冀藏之名山，垂为后世之轨则。非我辈后生，斐然狂狷，读书未遍，率尔操觚可比。

我又记起，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学之时，高田时雄教授跟我讲过一则轶事：第一任所长狩野直喜先生认为，初学者理当埋头读书，而不应急于发表成果。因此，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新进研究者三年内不许写论文。我深深地为这个故事所蕴含的学问之真精神所感动。在量化原则下，今之学者沦为计件民工，每日为炮制“速朽之作”，完成指标而苦斗。若有人天真地提起“千秋事业”之说，恐怕会沦为同行笑柄。然而，我们真的要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吗？我常常寻思，一个真正的学者，起点和终极到底在何方？也许有人会讲，既是“无涯之旅”，则无所谓起止。那么，立场呢？学者治学的基本立场在哪里？古人曰“文章千古事”，今人云“在学术上应该发扬比慢的精神”，我们是否仍可作为信念而坚守？在“美丽人生”与“追求学术之彻底性”之间，我

们应该如何抉择？

这些纠结，想必也是我的这些志同道合的学侣们的忧思。于是我们向往建立一个乌托邦，期盼在这个“艰难时世”努力生存的同时，有一泓荒漠甘泉，可以给我们枯槁的心灵带来慰藉；有一方文明的沃土，可以让思想的苇草惬意地生长；有一片无垠的天地，可以让我们信马由缰。由此，有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的成立。

所谓的研究班，只是一个没有建制的民间同仁团体，却代表了我们的学术理想。两年前，一群研究中古时代历史、语言、文学与艺术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商讨在学术日益泡沫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安身立命，是否能为中国学术做点什么。随后研究班悄然成立，致力于在互相砥砺中提升自我学术境界，并探索共同研究模式在中国学术生态中生发的可能性。研究班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党同伐异的山头。核心成员来自复旦历史系、文史研究院、汉唐文献工作室、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文系等五个单位，共十二位学者。此外，还有许多研究生、访问学者、校外和海外研究者，作为“观察员”和通讯成员加入。每两周组织一次 workshop，主要安排为新作发表与讨论、史料会读、学术信息交流与评论，至今已连续举行 36 次。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氛围，让我们怡然自得，乐以忘忧。理解当今学术生态下“青椒”处境的贤达，想必不难体会，这样完全依赖学问自身魅力而运作的“非营利性社团”，坚持到今日，是多么的不易！

我们的活动，逐渐引起相关院系和学校的关注，对我们深表“同情的了解”，施予各种援手，鼓励我们将实验继续下去，并从“211 三期”和“985 三期”项目中拨给专项经费予以资助，希望能将我们的苦心孤诣，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之，我受命策划这套丛书，作为见证梦想与现实张力之间的“试金石”。虽然不免有些俗套，我们仍想借此对所有给予包容和支持的人们，尤其是章清教授、金光耀教授、邹振环教授、杨志刚教授、葛兆光教授和陈尚君教授，表达由衷感激之情。

书系以“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为名，收录研究班主要成员的作品，表明了我们共同研究旨趣之所在。第一辑付梓的，除了我自己的那

本不过是往日杂稿的拼盘，其余大都是博士论文经数年打磨而写定的心力交“萃”之佳作。第二辑将要刊行的，则是研究班成立后历次往复匡谬正俗之结晶。尽管立意和方法不尽相同，但都代表了新一代学人对“基底性命题”的求索与回应。古人有云：“登山始见天高，临壑方觉地厚。不闻先圣之道，无以知学者之大。”况乃天道幽邃，安可斐然。同道乐学，博采经纬（研究班集体会读之《天地瑞祥志》，中多祯祥灾异、纬候星占之言），思接千载（诸君治学范围，上启秦汉，下探宋元，绵历千年），今略有所成，裒为一编。虽不敢“期以述者以自命”，然吾深信，绝不至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

在一次讲演中，我曾吟咏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烧毁的诺顿》(*Burnt Norton*, 中译参汤永宽译本, 略有改动), 以表达对人类历史之深邃与荒诞的敬畏和感动。现在, 我想再度征引这首诗, 作为对我们研究班的祝福, 也作为这篇缘起的“论曰”: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 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
If all time is eternally present All time is unredeemable.	假若全部时间永远存在 全部时间就再也无法挽回。
What might have been is an abstraction Remaining a perpetual possibility Only in a world of speculation.	过去可能存在的是一种抽象 只是在一个猜测的世界中 保持着一种恒久的可能性。
What might have been and what has been	过去可能存在和已经存在的
Point to one end, which is always present. Footfalls echo in the memory	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的终点。 足音在记忆中回响
Down the passage which we did not take Towards the door we never opened Into the rose-garden. My words echo	沿着那条我们未曾走过的甬道 飘向那重我们从未开启的门 进入玫瑰园。我的话就这样

Thus, in your mind.

在你的心中回响。

But to what purpose

但是为了什么

Disturbing the dust on a bowl of rose-leaves

更在一钵玫瑰花瓣上搅起尘埃

I do not know.

我却不知道。

Other echoes

还有一些回声

Inhabit the garden. Shall we follow?

栖身在花园里。我们要不要去

追寻?



2011年12月19日

目 录

书系缘起.....	余 欣	1
绪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回顾		4
第三节 研究取径		7
第四节 本书章节架构		12
第一章 地方官府祭祀与官神共理思维		15
第一节 “入境随俗”: 长吏到任谒神的传统		16
第二节 礼神依据: 地方自编祀典		22
第三节 祈祭的过程和祭祀对象		37
第四节 官神共理思维和祠祀信仰的统整		49
小结		66
第二章 唐宋之间地方祠祀具体规范的建立		69
第一节 唐五代朝廷无意管制各地祠祀		70
第二节 地方官游宦南方与祀神好巫之风		86
第三节 少数改造淫祀风俗事例的分析		106
第四节 从治政到教化: 北宋前期建立常民祠祀活动的规范		119

2 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	
小结	138
第三章 五代南方王国的封神运动	140
第一节 王国的自立与封神运动的展开	143
第二节 南方武人对陈果仁信仰的崇奉与封赠	153
第三节 封神活动“南热北冷”的现象	157
第四节 封神活动的内容与特色	166
第五节 北宋封神的“复盛”	175
小结	177
第四章 旌忠庙与贤人祠	179
第一节 赐封劝忠之风兴起	179
第二节 北宋中期祀贤运动的展开	206
小结	224
结 论	225
附录一 唐代城隍信仰与官府的立祀	
——兼论其官僚化神格的形成	232
附录二 宋代的封赐与祀典	
——兼论宋廷的祠祀措施	264
参考文献	287
后 记	301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传统中国社会中，信仰世界相当复杂，除了我们熟知的释、道二教之外，还有大量分布于各地的原生宗教。宋代以后的地方志，通常设立“祠庙”“神祠”或“祠祀”一门，记载这些佛、道教以外的信仰。这类信仰对象以祠庙和祠庙奉祀的神祇为主体，它们和释、道等组织性宗教最大的差异，在于欠缺有系统的经典支持，也缺少有体系的宗教人士的组织。然而，上述地方志的记载，反映出中国传统官方对宗教分类的概念里，这些释、道以外的中国原生宗教，是一个独立的类别。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界对这些原生宗教的研究相当沉寂。一直到1980年代以后，美国与欧洲学界在关怀中国通俗文化的热潮下，才开始推动此一研究领域。迈入1990年代，相关的研究已从附庸转为热门研究领域，个别学者的论著相继问世，也出版了两部论文集。^①近年来，汉学界迭有新书出版，中文学界关于唐宋时期祠祀信仰的论著也日益受

^① 有关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期，日、美汉学界对祠祀信仰的研究概况，蒋竹山曾以国家与祠祀信仰的关系为题，做过详细的研究回顾。参见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新史学》第8卷2期，第187—219页。

到注目,①且迄今热度不减。整体而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宋代以后,而且主要关注对宋代或后世影响较大的信仰,如城隍、五通、妈祖、梓潼、张王等信仰。

最初推动此一研究领域的国外学者,实欲以此为题,从精英文化以外的层面寻求对中国史的不同理解,他们往往称这类信仰为民间宗教。②在概念上,此一用语有强调其信众和价值观念“下层”的意味,因此,随着研究的推进,学者试图改以其他概念加以概括,如“地方祠祀”“祠祀信仰”“大众宗教”“神祠宗教”“神祠信仰”“祠神信仰”与“民众祠神信仰”等,反映不同学者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③

这类原生宗教,既是一般人信仰之所系,亦可能是官府祭祀的对象,而且,官府也会主动通过建祠立祀的活动,来纪念、表彰特定人物。这些带有纪念性质的立祀活动不一定具有信仰的成分,但是建祠立祀的形式和民众信仰基本上是相同的。本书使用“祠祀”一词进行讨论,除了指称分布各地的祠祀信仰,也包含国家和士大夫官僚群体建祠祭祀的活动(例如旌忠庙与贤人祠),希冀对官方和祠祀信仰这类原生宗教的关系,带来更丰富的考察视角。

长期以来,国家与祠祀信仰的关系一直是学者注目的焦点。以本书关注的唐宋时期而言,学者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祠祀信仰和国家权力与社

① 仅以本论文讨论的唐宋时期,近十余年来,中文学界关于唐宋祠祀信仰的研究颇为丰富,迭有重要作品问世。唐代的部分,参见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此书讨论国家祭祀的活动,亦兼及佛、道二教。宋代方面,参见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此书则是近年来讨论宋代祠祀信仰与社会变迁的新作。王章伟的论著则为专门讨论宋代巫觋信仰的代表性著作,参见王章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5年。余欣利用敦煌的文献,尝试提出“民生宗教”的概念,探讨此一课题,氏著《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另外,朱溢的一系列文章聚焦于唐宋国家礼制与祭祀问题,研究成果亦相当丰硕。

② 关于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的内涵与定义,亦是一个争论不断的问题,参见Stephen F. Teiser, “Chinese Religions: Popular Relig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4, No.2 (1995), pp.378–390。

③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220页;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第1—4页。

会生活的关系,已经累积了相当的成果,^①其中,国家权力和这些信仰的关系,始终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根据学者的考察,在唐宋两代两者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代较以往朝代更关注这些祠祀信仰活动,国家发展出许多具体的控制措施。^②

从比较的观点来看,相较中古时期的政权,宋朝确实更注意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何以宋朝更重视对各地祠祀信仰的控制?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宋代祠祀信仰大盛,统治者必须正视此一现实,由此发展出更多控制措施。于此,个人想尝试提出另一种考虑的可能性:所谓宋代祠祀信仰“大盛”,是指那些基层社会的信仰大量涌现于历史文献的记载,而有“兴盛繁荣之貌”。宋代大量赐封神祇的记载即是明显的例证,而且国家的赐封之制,显然对此一涌现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诚然,中国历代王朝都留心控制各种信仰,但是不同时期,有时关注的重点不同。中国中古时期,为人熟悉的佛教史上的三武之祸,即是国家打击佛教信仰的事例。此时,国家更挂虑佛教等组织性宗教可能带来的威胁。在讨论中古国家与祠祀信仰的关系,也要考虑这一点。

宋代大量涌现的祠祀信仰的记载,至少说明宋代分散各地的祠祀信仰,更受到统治者的注意,但是何以如此?个人认为,讨论上述问题,仍须回归到国家实际的治理经验。于此,本书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将进一步聚焦于唐宋之间国家面对南方祀神风气的作为。南方自古有好祀之风,但是以往讨论国家和祠祀信仰的关系,较少考虑此地祀神风气对帝国祠祀措施可能的影响。特别是唐宋之间南方整体力量的崛起后,帝国和统治阶层必须正视此地的治理,他们如何处置南方祀神风气?又,此一风气

^① 大体上,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唐代祠祀信仰的研究成果较少。宋代方面,研究的角度和课题比较多元,包括祠祀信仰的流变、释道和祠祀信仰的关系、对祠祀信仰作地区的综合性研究与国家权力对祠祀信仰的作为等等,都是学者讨论的焦点。雷闻和皮庆生二人的论著对唐宋祠祀信仰的研究概况进行比较详细的回顾,参见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 15—16,23—27 页;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第 7—14 页。为免与上述二书重复,本书不再进行详细的学术史回顾。

^② 近年来出版的两本论著也强调这种观点,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第 273 页;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 273—276 页。

对他们的祠祀措施又产生哪些影响？本书将说明，正视国家处理南方祀神风气的经验，将会对宋廷和士大夫官僚何以更关注祠祀信仰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考虑和理解。

在探讨此一问题时，本书将采取跨代的研究。讨论宋廷更注意各地的祠祀信仰，不能只着眼于宋代，个人将试图梳理唐宋之间国家对地方祠祀作为的变化。以往学者讨论这些变化，主要是以一种历史比较的视野加以讨论，很少真正从唐宋之间重大历史转变的背景，动态地考察国家对地方祠祀作为的变化。以下各章的讨论，将试图勾勒此一变化的历史面貌。

最后，对国家与祠祀信仰的关系，本书提出一种双向考察的视角。中国历代不乏贤人祠与忠臣庙，但是宋世以下，兴立大量的旌忠庙与贤人祠，确实是令人注目的历史变化。何以国家和士大夫官僚开始兴起、推动建立这两种祠庙的风气？既有的研究对国家与祠祀的关系只存在着单向的考虑，主要讨论国家控制祠祀信仰的措施，因此，很难解释上述这一醒目的历史变化。本书尝试说明国家和统治阶层大幅介入之后，其自身的政治行动也可能受到基层祠祀文化的影响。此一变化，有助于理解宋世以降何以出现大量的旌忠庙和贤人祠。

第二节 研究回顾

研究唐代祠祀信仰的学者，主要从礼制与礼典的规范探讨国家对地方祠祀的控制措施。此一研究领域起步较晚，大约在 1995 年以后才逐渐展开。西方研究唐代的学者原本就不多，近年来，研究人才更少，而关注“民间宗教”的西方汉学家往往因此时相关史料零散而裹足不前。故关于唐代祠祀的研究主要由唐史学者所推动，其研究取径较少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而主要受中古史学界自身的影响。他们主要讨论祠祀信仰与国家权力、祭典和礼制的关系，反映出中古史研究关注于国家与礼制的学术氛围。在这方面，金相范与雷闻的研究颇具代表性。

金相范和雷闻二人皆从国家礼制、礼典考察国家的祠祀措施。金相范的博士论文最早强调国家礼制对祠祀信仰的制约与规范,他颇受以礼探察皇帝支配制度的取径所影响,认为唐代皇权强化之后,政府企图独占人神之间的交流管道,因此,在地方上以社为基础推行正祀。最后,在官社无法制约乡村信仰生活时,政府又对神界实行赐额封号的礼仪措施,试图以礼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① 雷闻则以国家成文礼典所规范的制度框架,来考察地方祠祀运作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大唐开元礼》已将州县诸神祠列入小祀,赋予其合法的地位,祠庙的合法与否,则交由地方政府认定,并认为是国家制度上巧妙的安排。上述两人的观点略有不同,雷闻亦指出,唐代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的信仰文化传统,采取妥协与引导的立场。^②

至于研究宋代祠祀的学者,讨论的视角和上述研究有较大的差异,他们往往强调宋代国家以建立正祀与打击淫祀的两面手法积极管理地方祠祀,展现出不同于以往朝代的态度。所谓建立正祀,是指朝廷通过大量封爵赐额的措施,赋予地方祠祀合法的地位,^③而打击淫祀则是指朝廷不断

^① 金相范:《唐代礼制对于民间信仰观形成的制约与作用——以祠庙信仰为考察的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②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220—276、322—342页。

^③ 对于封赐制度的性质,多数学者认为是朝廷赋予祠庙合法化地位的依据。松本浩一最早提出,封赐的祠庙是正祠,与淫祠有所不同,封赐和打击是宋廷统制神祠的两面手法参见松本浩一《宋代の賜額・賜号について——主として〈宋会要輯稿〉にみえて史料から》,野口铁郎编:《中国史における中央政治と地方社会》,1985年度科研费报告,第286页。这种看法几乎为后来多数的学者所接受,参见须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廟の廟額・封号の下賜につ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1994年第9期,第110—113页;水越知:《宋代社会と祠廟信仰の展開——として地域の祠廟》,《东洋史研究》2002年第60期4册,第10—14页;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第296页。此外,对于封赐制度的性质,还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盛唐以后的封神措施是王权介入神界的体现。朱溢:《论唐代的山川封爵现象》,《新史学》2007年第18卷4期,第71—124页。另外,雷闻也指出,北宋中期以后封赐措施的大盛,反映宋代欲建立一个由皇权支配新的神界信仰体系。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276页。第二种观点认为,封赐措施是国家创造神祇标准化的象征,可以有效整合各地的祠祀信仰。James Watson 以妈祖信仰为例,从中国帝国晚期社会文化整合的问题出发,提出此一观点。James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ng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292—324.